《東華漢學》第 22 期；1-44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5 年 12 月

# 【特邀稿】
# 論裴松之《三國志注》中的「三吳之書」*

王文進**

## 【摘要】

本文以裴松之《三國志注》中引用的三部史籍：韋昭《吳書》、胡沖《吳曆》、張勃《吳錄》作為考察對象。由於三本書名皆有一「吳」字，其作者也都是仕於東吳或來自江東門閥士族的人物，故本文統稱為「三吳之書」。其在三國史的研究領域中，屬於《裴注》的一環，而本文認為《裴注》的研究分為兩大區塊，大致而言：其一，《裴注》引用諸書，但凡在陳壽撰《三國志》前已存的，其內容為何遭陳壽刪棄？其二，《裴注》中所列出《三國志》問世後的史書，它們又如何補充和挑戰陳壽建構的三國史？總之，本文以《三國志》和《裴注》皆作為史料的觀點，將彼此放入三國史的脈絡中考察，重新發現三國史的新圖像，從而建構較為真實的三國歷史。

**關鍵詞：《三國志注》、陳壽、裴松之、孫吳、南北對立、韋昭《吳書》、胡沖《吳曆》、張勃《吳錄》**

---

* 本文為國科會多年期研究計畫：〈裴松之《三國志注》中南方史籍之研究〈100-2410-H-259-050-MY3〉的成果之一。宣讀於 2014 年第二屆臺大、成大、東華三校論壇學術研討會

**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榮譽教授

# 一、前言

司馬氏於公元280年統一了自黃巾之亂（184）以來近百年的紛爭，而蜀國（221-263）的陳壽（233-297）於公元290年在西晉（265-316）為官時，以宏觀的視野整理了魏（220-265）、蜀、吳（229-280）三國鼎立的前因後果，寫就《三國志》一書[1]。事隔一百四十年左右，劉宋（420-479）裴松之（372-451）奉宋文帝（424-453在位）之〈詔〉對文義稍嫌簡略的《三國志》引用了兩百多本書籍加以註解（以下簡稱《裴注》），其中有一百五十七種是史籍。[2]

這一百多種史籍中可視為裴松之對《三國志》的質疑與補充。所引之書分別具有各自美化家邦故國人物事蹟的性質，與爭奪歷史解釋權的伏流暗筆。其中韋昭（204-273）《吳書》、胡沖《吳曆》、張勃《吳錄》均有明顯偏袒孫吳的傾向，與曹魏北方王沈《魏書》[3]、魚豢《魏略》[4]極

1 李純蛟考證《三國志》應成書於太康之世，《陳志》成書後曾遭到權臣荀勗的不滿，考《晉書・武帝紀》荀勗卒於太康十年（289），則其書成至遲不會早於此年。見氏著：《三國志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2），頁14。而朱曉海也曾考訂：「《三國志》全書告成約當西晉武、惠之際。」見氏著，〈西晉佐命功臣銘饗表微〉，《臺大中文學報》第12期（2000.5），頁151。故本文將《三國志》成書訂為290年。

2 有關《裴注》引書數據，可參逯耀東，〈《三國志注》引用的魏晉材料〉，參氏著：《魏晉史學的思想及社會基礎》（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公司，2000），頁391-412。余志挺，《裴松之《三國志注》研究》（臺北：國立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03）。另大陸學者鄭鶴聲亦曾就與《三國志》之相關正史典籍，及歷代《三國志》之論著進行匯目與提要，並搜羅共129種之多，亦可備為補充。鄭鶴聲著，鄭一鈞整理，《正史匯目》（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頁146-177。

3 相關研究可詳參王文進，〈論王沈《魏書》對三國史的詮釋立場〉，發表於「第14屆『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2012年5月4-5日。另尚可參考日・滿田剛，〈王沈《魏書》研究〉，《創価大学大学院紀要》第20集（1999），頁263-278。

4 相關研究可詳參王文進，〈論魚豢《魏略》的三國史圖像〉，《中國學術年刊》第33期（2011.6），頁1-34。另可參羅秉英對於《魏略》、《典略》、

力偏袒曹魏司馬氏的立場截然不同。[5]本文擬將「三吳之書」置於所有三國史的文獻中詳加參照比對，企圖就此解析裴松之所引之史書如何順此途徑得以視為重新探究三國史真相的基礎工作。[6]

在進行「三吳之書」的研究之前，必須先就裴注所引史書進行兩大形式的歸類：所謂《裴注》的兩大類，第一類是陳壽《三國志》成書之前可得以見之的資料，如：王沈《魏書》、魚豢《魏略》等，這些書經由《裴注》保存，可據此推敲陳壽何以刪棄史籍的片斷，所以本文所謂「三吳之書」中的韋昭《吳書》、胡沖《吳曆》即屬於此類；另一種則是陳壽成書之後才出現的史書，如：虞溥《江表傳》[7]、習鑿齒《漢晉春秋》、《襄陽記》[8]、孫盛《魏氏春秋》、《晉陽秋》及本文所欲討論的張勃《吳錄》即為第二類，這些書在史學意義上可視為對陳壽的質疑與挑戰。順此，若再將這兩種類史籍置入三國典籍的脈絡中，詳加分析比對即可統視為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9]

---

《魏書》、《晉書》等探討，見氏著，《治史心裁：羅秉英文集》（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5）。

5 楊翼驤，〈裴松之與《三國志注》〉：「由於三國時代是分裂割據的政治局面，時有戰爭發生，又上與東漢、下與西晉相交錯，情況複雜，以致當時各國記載既竟各自宣揚，誣衊敵國；而私家撰錄又以交通阻隔，聞見不同。因此，各種歷史著作的記載常有錯誤和歧異之處。」收錄於張越主編，《〈後漢書〉、〈三國志〉研究》，《20 世紀二十四史研究叢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卷五，頁 436。案：其實《裴注》所引史籍，不可逕謂之「錯誤」與「歧異」，應視為其各具立場之敘事行為。

6 相關研究可詳參王文進，〈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裴松之《三國志注》的兩種讀法〉，收入於「林文月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2013 年 9 月 5 日。

7 詳參王文進，〈論《江表傳》中的南方立場與東吳意象〉，發表於「奇萊論學－第一屆臺大成大東華三校論壇學術研討會：古典與新潮」會議，國立東華大學中國文學系，2013 年 6 月 1 日。後經審查通過並略微修訂刊登於《成大中文學報》第 46 期（2014.9），頁 99-136。

8 相關研究可參王文進，〈習鑿齒與諸葛亮神話之建構〉，《臺大中文學報》（2012.9），第 38 期，頁 71-120。另可參日・田中靖彥，〈《漢晉春秋》に見る三國正統觀の展開〉，《東方學》第 110 輯（2005.7），頁 49-64。又，方圓，《習鑿齒之史學》（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論文，2009 年）。

9 海登懷特（Hayden White）一再強調史料本身並無法建構出歷史之客觀性，

## 二、韋昭《吳書》視孫吳為代漢政權

韋昭即韋曜，裴松之認為陳壽避晉文帝司馬昭（211-265）諱故改書韋曜[10]，關於此自清代以來即已有諸多學者論及：如清人杭世駿（1698-1773）《諸史然疑》即云：

> 又裴松之稱史為晉諱，改韋昭為韋曜，按《魏志》胡昭、董昭、《吳志》張昭皆仍舊名，奚獨韋昭乃改稱曜？意是魏（志）仍王（沈）、魚（豢）諸人舊文；吳（志）仍華覈、韋昭國史，韋在歸命侯（孫皓）時，《吳書》未為（韋昭）立傳，壽特草創故也。[11]

或如錢大昕（1728-1804）《廿二史考異》卷十七〈三國志〉則曰：

> 《三國志》於晉諸帝諱，多不回避。……此韋曜之名，注家以為避晉諱，於考書中段昭、董昭、胡昭、公孫昭、張昭、周昭輩皆未追改，何獨於曜避之？疑弘嗣本有二名也。[12]

規撫二說，當知韋昭作《吳書》時本人未立傳，而陳壽撰史已入晉世，提及韋昭遂有避諱之虞[13]。韋昭先在孫和（224-253）為太子時擔任

---

因為任何歷史著述均滲入史家的自我「闡釋」，而「闡釋就至少以三種方式進入歷史修撰之中：美學的（在對敘事策略的選擇上），認識論的（在對解釋範式的選擇上），和倫理學的（在讓特定再現如何對理解現存社會問題具有意識形態含義的策略的選擇上）。」見美・海登懷特著，陳永國、張萬娟譯，《後現代歷史敘事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頁 92。換言之，恢復歷史原貌永遠無法實現，但卻可藉由爬梳比較各家史觀之差異而逐漸貼近「較真實」之歷史。

10 《三國志》卷 65《吳書・王樓賀韋華傳》裴松之自注。見西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1460。

11 清・杭世駿，《諸史然疑》（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5。

12 清・錢大昕，《廿二史考異》（方詩銘、周殿傑校點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 313-314。

13 唐燮軍考據韋昭避諱事，稱說源自清人趙翼與杭世駿，然其書所引趙翼之書實為清人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疑為唐氏誤植。見氏著，〈韋曜《吳

太子庶人，孫和遭廢黜後改立孫亮（252-258在位），諸葛恪（203-253）乃表韋昭太史令，並開始撰寫《吳書》；孫休（吳景帝，258-264在位）即位後，依漢代（西漢，202B.C.-8）劉向（77B.C.-6B.C.）故事，校訂眾書；孫皓（吳末帝，264-280在位）即位，這時韋昭因為是否該為孫皓之父廢太子孫和「立紀」的問題與末主相左，因此觸怒孫皓，最後收付獄司，遭到誅殺。至於《吳書》是否成於韋昭一人，王鳴盛（1722-1797）據《陸士龍集》載《與兄平原書》論陳壽《三國志・吳志》有闕云：「又考《薛綜傳》孫皓時華覈上疏曰『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駿始撰《吳書》。……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薛綜）五人共撰。』然則士雲所稱《吳書》不冠以陳壽者，當即五人作。」[14]顯然認為《吳書》係韋昭、周昭、薛瑩（?-282）、梁廣及薛綜五人共撰。劉知幾（661-721）《史通・外篇・古今正史》云：「吳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駿撰《吳書》……其後（韋）曜獨終其書，定為五十五卷。」[15]則又認為是韋昭獨自完成《吳書》，清代沈家本（1840-1913）進一步推斷：「《史通》云曜終其書，殊非事實。惟書非成于韋手，而仍屬之于韋者，大約此書體例皆韋手定，不為孫和作紀乃其一端，韋在時稿本已具，特未裁定奏上耳。故書之成也，華、薛皆不敢居以為功，華、薛二《傳》亦不言作《吳書》也。」[16]沈說當無可議，本文從之。

又韋書體例及對後代史著之影響，唐燮軍有專文考辯[17]，本文不再贅述。惟確認韋昭《吳書》作為東吳官方史籍，屬於陳壽撰寫《三國志》

書》考辨－兼論《建康實錄》對《吳書》的徵引〉，《中國典籍與文化》第 71 期（2009），頁 66。又可參見氏著，〈符瑞、時政與韋昭《洞紀》〉，收入氏著，《史家行跡與史書構造－以魏晉南北朝佚史為中心的考察》（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頁 17。

14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陳文和校點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頁 233。

15 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臺北：世界書局，2009），頁 165。

16 清・沈家本，《三國志注所引書目》，收入於嚴靈峰編，《書目類編》第 56 卷（景印沈寄簃先生遺書本，臺北：成文出本社，1978），頁 25549。

17 唐燮軍，《史家行跡與史書構造——以魏晉南北朝佚史為中心的考察》（杭

時得以參考的《裴注》中第一類史籍，進而脫離考據之辨置入三國史的語脈中考察其文本。本文擬暫擱置考據之爭，將其置入三國史的語脈中進行與《三國志》之間互文關係的探討。

## （一）韋昭強調孫吳讖緯符瑞而為陳壽刪減

陳壽在處理三國史料時事實上並未完全排斥符瑞讖緯之說[18]，如《三國志》卷二〈文帝紀〉曰：「初，漢熹平五年，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恆象，此其應也。』內黃殷登默而記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黃龍見譙，登聞之曰：『單颺之言，其驗茲乎！』」[19]又《三國志》卷六二〈胡綜傳〉：「黃武八年夏，黃龍見夏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20]白壽彝（1909-2000）言：「陳壽很推重周群、杜瓊和譙周，蜀漢的幾個方士化的學者，通過他們的傳記去宣揚皇權神授的觀點。」[21]事實上漢末晉初史家喜於採擷玄異之說，《史通》已多有論及：「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煩。……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異新事。……而嵇康《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玄晏《帝王紀》，多採六經圖讖。引書之誤，其萌於此矣。」[22]韋昭在孫亮時受諸葛恪表為

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又可參氏著，〈韋曜《吳書》考辨——兼論《建康實錄》對《吳書》的徵引〉，《中國典籍與文化》第 4 期（2009），頁 66-73。此外尚有張子俠，〈《吳書》作者考辨〉，《史學史研究》第 130 期（2008），頁 110-113。

18 王文進，〈論王沈《魏書》對三國史的詮釋立場〉，發表於「第 14 屆『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2012 年 5 月 4-5 日。

19 《三國志・魏書・文帝紀》，見《三國志》，頁 58。

20 《三國志・吳書・胡綜傳》，見《三國志》，頁 1414。

21 白壽彝，〈陳壽和袁宏〉，收入氏著，《中國史學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 163。

22 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臺北：世界書局，2009），頁 55。

太史令撰《吳書》，從《三國志》卷六五〈王樓賀韋華傳〉中已經可以看出其人對於讖緯符瑞之說並不排斥[23]：

> 孫皓即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為侍中，常領左國史。時所在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韋）曜，曜答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24]

胡三省對此註云：「言祥瑞而為之家人筐篋中物者，蓋稱引圖緯以言祥瑞之應，故謂其書為家人筐篋中物也。」[25]這意味著韋昭在這裡順應孫皓的話題進而稱說祥瑞嘉兆，唐燮軍更藉由韋昭《洞紀》所載皆為符瑞之事進一步推斷該書為「孫吳當局崇信符瑞並將之上升為重要治國策略這一政治運動的產物。」[26]由此觀之則可見韋昭常以祥瑞之事加諸孫吳家族。

事實上觀諸韋昭所著《吳書》，對於讖緯符瑞之說總是不遺餘力詳加載錄，例如東吳創業君主孫堅（155-191）：

> 堅世仕吳，家於富春，葬於城東。塚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蔓延數里。眾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孫氏其興矣！」及母懷妊堅，夢腸出繞吳昌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容貌不凡，性闊達，好奇節。[27]

這一段君王出生的本末，正好印證了韋昭個人對於這類祥瑞圖讖的重視。國君先祖墓塚的光怪異象，及其母懷孕時作的異夢，均顯示出創業君主的天命。相對於陳壽《三國志》本文中，卻對孫堅的出生僅以素筆淡描：

---

23 雷家驥認為韋曜是「反圖讖的理性主義者」。唐燮軍已駁之。見前引文頁70。

24 《三國志》卷65《吳書・王樓賀韋華傳》，見《三國志》，頁1462。

25 北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80《晉紀二》（臺北：成文出版社，1977），頁2531。

26 唐燮軍，〈符瑞、時政與韋昭《洞紀》〉，《史家行跡與史書構造：以魏晉南北朝佚史為中心的考察》，頁28。

27 《三國志》卷46《吳書・孫破虜討逆傳注》引《吳書》，見《三國志》，頁1093。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28]

比起韋昭對於孫堅出生時祥瑞的刻意誇飾，陳壽言及孫堅為孫武之後雖然也有顯赫的來歷，但是兩相比較，就會發覺陳壽筆下的孫堅出生顯得相對平凡單調。因為陳壽在記載蜀漢先主劉備（161-223）時，就繪聲繪色強調其出生及其年幼時的符瑞現象：

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29]

陳壽將先主這段語出驚人的幼時傳說置入正史本文中，與吳國的孫堅兩相對照就會發覺，陳壽其實是蓄意刪掉孫堅出生的符瑞傳說。原因在於韋昭《吳書》作於三分歸晉前，成為陳壽撰寫東吳國史重要的依據。既然《蜀書・先主傳》有幼時傳言，而《吳書・孫破虜討逆傳》卻刪去了祥瑞傳說，這意味著陳壽乃是刻意壓抑吳國稱霸的天命依據，甚至進一步可以推斷，陳壽有意偏袒蜀國先主劉備。

## （二）韋昭《吳書》中應運東南的氛圍遭到陳壽裁減

讖緯符瑞之所以為士人所重視，乃是因為其背後蘊藏著國家正統性的訊息。《孫破虜討逆傳》中孫堅的祥瑞之說遭到陳壽刪棄，無疑就有削弱其政權統緒的企圖。更明顯的例子，則在陳壽刪去《吳書》中兩則「應運東南」[30]的外交辭令：首先是建安二十五年（220），是年曹操（155-220）死，曹丕（187-226）代魏王，旋即篡漢。隔年劉備亦稱

28 《三國志》卷46《吳書・孫破虜討逆傳》，頁1093。

29 《三國志》卷32《蜀書・先主傳》，頁871。

30 「應運東南」的傳說係始自秦始皇時代（247B.C.-210B.C.）的預言，流傳至三國時（220-280）已強化為一種爭奪正統的意象。前者可見《史記》卷8《高祖本紀》：「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見西漢・司馬遷撰，《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348。

帝，當時孫權（182-252）為了對抗蜀漢復仇之師[31]，於是一面派陸遜（183-245）為督以拒之，一面向魏國稱藩，遂有趙咨出使之舉：

> 是歲，劉備帥軍來伐，至巫山、秭歸，使使誘導武陵蠻夷，假與印傳，許之封賞。於是諸縣及五谿民皆反為蜀。權以陸遜為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遣都尉趙咨使魏。魏（文）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32]

陳壽《三國志》本文所描述這段趙咨的對話已經精彩絕倫，其出使雖是代表東吳孫家向曹魏稱臣，卻以不卑不亢的話語巧妙反擊了魏文帝曹丕的嘲難。然而事實上韋昭《吳書》卻有著更加精采喧騰的筆墨：

> 咨字德度，南陽人，博聞多識，應對辯捷，權為吳王，擢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代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藉採奇異，不效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不？」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地，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咨頻載使北，（魏）人敬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言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33]

如果陳壽筆下的趙咨若僅止於剛柔並濟，遊刃有餘，那麼韋昭筆下的趙咨幾乎可說是喧賓奪主，如入無人之境。尤其韋昭藉由趙咨之口道出東

31 《三國志》卷 32《蜀書・先主傳》載：「初，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將東征，秋七月，遂率諸軍伐吳。」見《三國志》，頁 890。

32 《三國志》卷 47《吳書・吳主傳》，見《三國志》，頁 1122-1123。

33 《三國志》卷 47《吳書・吳主傳注》引《吳書》，見《三國志》，頁 1123-1124。

吳士民深信不移的「應東南之運」，箇中攜帶著韋昭作為東吳官方史家的立場。而陳壽之所以不錄此說，很可能是基於晉室官吏或者蜀國故民的身分對吳國「應運東南說」稍加裁抑。

另一個例子則是陸遜破蜀軍後，魏、蜀、吳三方勢力再次平衡，而劉備旋即逝世後，吳國派陳化出使魏國的記載：

> 以尚書令陳化為太常。化字元耀，汝南人。博覽眾書，氣幹剛毅，長七尺九寸，雅有威容。為郎中令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帝笑，無以難；心奇其辭，使畢當還，禮送甚厚。[34]

這段文字無疑可視為東吳對於「應運東南說」的官方解釋，而由此可知在孫吳宮廷中普遍流傳是項傳說。而且此說有來源可循：係源於《易經》所謂「帝出乎震」[35]中，更加強化孫吳乃天命所歸。如此引經據典、本末俱在，幾乎無懈可擊的「應運東南說」在陳壽的《三國志》正文中卻遭到弱化，只零散見於《周瑜魯肅呂蒙傳》、《吳範劉惇趙達傳》[36]的敘述中。

---

34 《三國志》卷 47《吳書・吳主傳注》引《吳書》，見《三國志》，頁 1132。

35 《易經》卷 9《說卦傳》：「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見明・張鏡心，《易經增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68。

36 《三國志》卷 54《吳書・魯肅傳》載周瑜謂魯肅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祕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曆數。終撫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騖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見《三國志》，頁 1268。又《三國志》卷 63《吳書吳範傳》載：「初，權為將軍時，範常白言江南有王氣，亥子之間有大福慶。」見《三國志》，頁 1422。

實際上，陳壽對於東吳的「應運東南說」是有所察覺的，即便陳壽刪除了大部分韋昭《吳書》中的史料，但是在他的《三國志》本文中卻留下了一些蛛絲馬跡，例如：魯肅之所以加入東吳，也與「應運東南說」脫離不了關係：

> 劉子揚與肅友善，遺肅書曰：「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眾萬餘，處地肥饒，盧江閒人多依就之，況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答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周）瑜已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權尚在吳，瑜謂肅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秘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曆數，終搆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騖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37]

似周瑜、魯肅這般東吳政權中的佼佼者，竟然也信從所謂「先哲秘論，興于東南」的說法。這段文字顯示：至少從孫策死後，東吳政權的主要組成份子之間就已經流傳這樣的言論，並且深信不疑地將其視為東吳代漢的預言。而這類應運東南說的蛛絲馬跡雖然看似在陳壽《三國志・吳書》中獲得部分保留，但也在在說明陳壽蓄意刪減更多相關顯著的史料：無論陳壽是站在史家制高點看到吳國終趨敗亡，或是晉吏蜀人的身分，「應運東南」的言論皆須避重就輕。

## （三）韋昭《吳書》中的文化正統爭奪戰

儘管三國時代各政權是獨立運作的政治實體，但是不可否認的，曹魏擁有最多的文化資源。因為在地理上曹魏畢竟控制了漢代東、西兩都，而「建安風骨」在文學史上有著不容動搖的地位。既然曹家在歷史

37 《三國志》卷 54《吳書・魯肅傳》，見《三國志》，頁 1268。

上坐擁文化高位，吳國想當然爾就背負著文化不如北方的重擔。於是韋昭《吳書》中即存在爭取南方文化優勢的「歷史解釋」大責。孫吳與北方文化的連結源自於蔡邕（132-192），禮夢庵云：「邕後避仇於江南，又收顧雍為弟子，將文風帶到南方去。」[38]證諸范曄（398-445）《後漢書》載：

> 帝嘉其高才，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智者，中長侍王甫弟也……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內寵惡之。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39]

《吳志》顧雍（168-243）本傳記「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40]蔡邕是漢末受到十常侍排抑的清直名士，後來在中平六年（189）迫於董卓（?-192）威脅再度進入漢廷，其對董卓的節制可參《後漢書》本傳。其在漢末正六經更可見出代表北方文化重鎮的地位，既然蔡邕本人曾於避禍吳會十二年，那麼孫吳的士人若自詡為文宗正統亦不足為奇。韋昭也在所作《吳書》中透露出東吳士人試圖在文壇地位上與北方分庭抗禮，其人就是在建安五年（200）孫策遭刺後於漢廷力勸曹操，使其暫緩進攻孫吳的張紘（153-219）。

在孫策時代就效忠東吳的張紘曾經對孫策親蒞戰場諫說：「夫主將乃籌謨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41]而後奉章至許都，在曹操聽聞孫策死亡，打算一舉伐吳的時候，也是張紘諫言「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42]於是曹操表孫權為討虜將軍，可以說孫吳政權的穩固有賴張紘。然陳壽《三國志》本文中

---

38 禮夢庵，《三國人物論集》（臺北：臺灣商務，1996），頁 323。

39 《後漢書》卷 60《蔡邕列傳》。見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2003。

40 《三國志》卷 52《吳書・顧雍傳》，見《三國志》，頁 1225。

41 《三國志》卷 53《吳書・張紘傳》，見《三國志》，頁 1243。

42 同前註，頁 1243-1244。

只稱其「著詩賦銘誄十餘篇」，韋昭《吳書》卻保留了張紘為時所重的文采：

> 紘見枏榴枕，愛其文，為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紘既好文學，又善楷篆，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43]

張紘與陳琳（?-217）皆為廣陵人，若依此推斷張紘和陳琳極有可能如韋昭所載彼此交流。然而何以陳壽撰《吳志》不錄這段往事？這段文字首先以陳琳作為與張紘對舉的文士，眾所皆知陳琳乃是「建安七子」之一，甚至在他為袁紹典文章時曾撰移文討曹操，留下著名的〈為袁紹檄豫州文〉，所幸曹操因愛才而不咎[44]。由此可知陳琳文才乃是北方的佼佼者，而陳琳見到張紘的賦作卻情不自禁地示諸於人，表示其以同鄉與有榮焉，此乃假北方文壇上馳所推崇烘托張紘的文化地位。事實上不得不注意張紘其在孫吳文壇的地位，東晉張勃《吳錄》就記載張紘為孫策作書絕袁術[45]，正如王永平所言「張紘在應用文學領域也堪稱孫吳之主將。」[46]依曹丕《典論・論文》的分析來看，陳琳善於表章書記，這樣一來何

---

43 《三國志》卷 53《吳書・張紘傳注》引《吳書》，見《三國志》，頁 1246-1247。

44 《三國志》卷 21《魏書・王粲傳》載：「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見《三國志》，頁 600。

45 《三國志》卷 46《吳書・孫討逆傳注》引《吳錄》其中有云：「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躓頓，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強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盍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而裴松之也認為：「《典略》云張昭之辭。臣松之以為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紘之文也，此書必紘所作。」見《三國志》，頁 1105。

46 王永平，〈漢末流寓江東之廣陵人士與孫吳政權之關係考述〉，收入氏著，

以韋昭以本國張紘的文賦對捋陳琳即可明矣；然更重要地是韋昭這段文字隱隱建構出南北雙方各有文士，足以分庭抗禮的氛圍。

田餘慶、王永平曾論及孫氏家族重法家權術，與江南重視儒術的大族起初並不乏齟齬之處，隨著孫權上任以及孫氏政權的江東化才將彼此的矛盾逐漸緩和[47]。此與漢末蔡邕於靈帝熹平六年（177）流寓江南十二年至中平六年（189）回歸漢廷可推斷：儒學正統的蔡邕在江南傳揚學術的積累至孫吳建國已有相當長的時間，韋昭或許基於江東握有中原文化的正統繼承權，抑或者在孫氏家族與江東士族間法儒兩家的對峙下，不得不以北方知名文士陳琳與效力江東的同鄉張紘對比，提高江東政權文化上的地位。韋昭的筆意甚至隱然進一步烘托江東文風盛於北方的氛圍[48]，以陳壽撰史的立場，這種極力誇耀孫吳文化地位的文字當然亦有所裁抑。

## （四）《吳書》對醜化劉表不遺餘力

韋昭《吳書》不只有刻意美化東吳國際地位的文字，即便是對於外交對手如荊州劉表（142-208）也不放過打壓的機會。東吳孫家與荊州劉表的恩怨可見諸陳壽《三國志》初平三年（192）的記載：

> 初平三年，術使堅征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閒。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49]

---

《孫吳政治與文化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335。

47 見田餘慶，〈孫吳建國之路〉，收入氏著，《秦漢魏晉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264-297。王永平，〈論孫權與儒學朝臣間政治觀念的分歧及其鬥爭〉，《孫吳政治與文化史論》，頁 31-51。

48 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見《三國志》卷 53《吳書・張紘傳注》引《吳書》，見《三國志》，頁 1246-1247。

49 《三國志》卷 46《吳書・孫破虜傳》，見《三國志》，頁 1100。

東吳兩位開國君主可說都是間接死於劉表之手，雙方的仇怨就此加深。而韋昭《吳書》在談及甘寧（175-220）這位從黃祖（?-208）手下來奔的先賢時更是加以用心經營，不忘乘機羞辱國仇劉表：

寧將僮客八百人就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時諸英豪各各起兵，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土崩，並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不禮之。權討祖，祖軍敗奔走，追兵急；寧以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校尉淩操。祖既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50]

甘寧先依劉表、後託黃祖，最後投孫吳。韋昭這段文字首先解決了甘寧與舊主的關係：其處於荊州未受重視，即使盡忠職守立功殺敵也沒有因此受到重用。而更要的是這段文字將荊州主臣劉表與黃祖的缺點表露無遺：劉表不習軍事，黃祖識人不明。韋昭利用這段文字巧妙的解決甘寧射殺東吳將士淩操的不得已，並且不露痕跡地譏諷劉表陣營的無能。陳壽對於甘寧這段遇合卻僅以「乃往依劉表，因居南陽，不見進用；後託黃祖，祖又以凡人畜之」[51]一筆帶過，雖然亦暗示甘寧乃非常人，但明顯少了對荊州劉表的敵意。

## 三、胡沖《吳曆》極力誇耀東吳先賢

歷來對於胡沖《吳曆》一書的成書時間始終沒一個公論，但是本文依照陳壽於《三國志・王樓賀韋華傳》最後的評語，將此書定為《裴注》第一類史籍：

> 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才理條暢；賀邵立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羣籍，有記述之才。胡沖以為玄、邵、蕃一時清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予觀覈數

[50] 《三國志》卷 55《吳書・甘寧傳注》引《吳書》，見《三國志》，頁 1292。
[51] 同前註，頁 1292。

> 獻良規，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而有名位，強死其理，得免為幸耳。[52]

此段評語陳壽引用了孫皓（264-280在位）時代的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兩人對傳主王蕃、樓玄、賀邵、韋曜、華覈等東吳士人的評價作為準的，之後才說明自己的看法。可見陳壽在撰史時，薛瑩和胡沖的說法一定已經流傳於世，並且陳壽認為他們的言論可觀足以引為史評的依據，故本文以此將胡沖《吳曆》視為陳壽撰《三國志》時能夠見到的史料，即本文所謂《裴注》第一類史籍。

胡沖乃是吳國大臣胡綜之子，胡綜則是孫權的伴讀。孫權掌權後，文誥策命、鄰國書符都是胡綜所作。孫權稱帝後進胡綜為鄉侯，由此可知胡綜與孫權的關係的淵遠流長。死後其子胡沖嗣位，在孫皓末期也是因為胡沖和薛瑩的建議吳國才降晉[53]。關於胡沖的記載，資料並不全，但是依現存的《吳曆》仍可見其書保留許多有利於吳國的史料。

## （一）「豈徒外藩而已哉？」——《吳曆》拓展孫策格局

漢末天下擾攘，具有資格問鼎中原的地方豪強紛紛出現，形成割據之局。但在建安25年（220）曹丕篡漢前，群雄始終還是以遙尊漢室作為號召。即便是擁有雄厚實力的曹操，其生前也不敢僭越尊號。然而《吳曆》中卻記載了張紘與孫策的一段對話：

---

52 《三國志》卷65《吳書・王樓賀韋華傳》評曰，見《三國志》，頁1470。

53 《三國志》卷62《吳書・胡綜傳》：「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難江東。孫策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為門下循行，留吳與孫權共讀書。策薨，權為討虜將軍，以綜為金曹從事，從討黃祖，拜鄂長。權為車騎將軍，都京，召綜還，為書部，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見《三國志》，頁1413。胡沖請降事載於《三國志》卷48《吳書・三嗣主傳》：「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伷、王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伷、渾曰：『昔漢室失統，九州皆分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命。至于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夕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見《三國志》，頁1176。

初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策數謁紘，諮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俊傑各擁眾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為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讎雪恥，為朝廷外藩。君以為何如？」紘答曰：「既素空劣，方居衰絰之中，無以奉贊盛略。」策曰：「君高明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之於君，何得不紆慮啟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展，血讎得報，此乃君之勳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橫流，顏色不變。紘見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寧，諸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楊，收兵吳會，則荊、揚可一，讐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群穢，匡輔漢室，功業侔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君同符合契，（同）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策無復回顧之憂。」[54]

這段資料中張紘的方略就是東吳稱霸的戰略：先投袁術，依吳景（策舅，時為丹楊太守）收拾舊兵，然後佔有揚州建立基業。這段文字箇中謀略與遠途已不亞於諸葛亮的「隆中對」。更何況《吳曆》這段文字更著力推崇孫策，將他塑造成「急父仇、驍武力、忠漢室」的「漢臣」：因為在這段史料中孫策的初衷只欲報父仇後做個羽翼漢朝的外藩，並不輕言問鼎漢柄。王船山論魏蜀吳三國稱：

蜀漢之義正，魏之勢強，吳介其間，皆不敵也，而角立不相下，吳有人焉，足與諸葛擷頏。……立國之始，宰相為安危之大司，而吳捨張昭而用顧雍，雍者，允為天子之大臣者也，屈於時而相偏安之國爾。[55]

54 《三國志》卷 46《吳書・孫討逆傳》，頁 1102-1103。

55 清・王夫之撰，舒士彥點校，《讀通鑑論》卷 10《三國》（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257。

船山此論雖是基於《資治通鑑》的記載，亦見出孫吳起用本地士族為相的意義；但也坐實韋昭意欲藉本國先君先賢的對話進一步擴大孫吳創業之基宇的心曲：透過張紘這段「江都對」，孫策開拓了將來鼎足江東的格局，進而虎視荊、揚成為孫吳的拓基之君。對比將來孫權投降曹操、受封吳侯來看，孫吳不得不面對時論對自己稱臣之舉的謗訕；胡沖此記則追本溯源，稱說孫策立足江東實已早立基宇，絕非止步於「外籓」。

然則張紘這段文字卻使得江東孫氏政權，由原本輔翼漢廷的初衷定調為進窺神器的鼎足政權。陳壽在晉朝主導的北方史觀下自然無法採擇《吳曆》這段文字列入官方史籍之中。

## （二）東吳版的「臨終託孤」幸賴《吳曆》得以保存

若是對三國故事稍有了解的人，對蜀國劉備和諸葛亮（181-234）君臣之間毫無隔閡的相知之情一定印象深刻，[56]事實上，這兩位蜀國的君臣確實締造了「三顧茅廬」神話：

> 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謁亮，凡三往，乃見。[57]

>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58]

---

56 諸葛亮在生前身後皆有不少各種詠嘆或詆毀其形象的傳說故事，可詳參陳翔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諸葛亮故事傳說〉。收錄於氏著，《三國志演義縱論》（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頁 248-265。

57 《三國志》卷 35《蜀書・諸葛亮傳》，頁 912。

58 同前註，頁 920。

從這兩段資料可以看出，確實有「三顧茅廬」[59]這段歷史佳話並且盛名遠播。[60]以至於當時有曹魏魚豢私撰《魏略》攻擊這段相遇之恩。[61]此外蜀漢最令人稱道的尚有「白帝城託孤」：

> 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62]

而事實上胡沖《吳曆》也有東吳版的「臨終託孤」：

> （孫）策謂（張）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63]

蜀國劉備託孤這段故事的年代係在章武三年（223），劉備於夷陵之役慘敗退居白帝城之時；而就歷史事件而言，胡沖《吳曆》上文所載係在建安五年（200），甚至還早於古今盛稱「白帝城託孤」23年。若按本文所論，陳壽著書時定可見胡沖《吳曆》，則孫策託孤張昭一事也必然為陳壽所知。金性堯（1916-2007）便視孫策與劉備的託孤之語為三國

---

59 《水經注》卷 28〈沔水注〉：「沔水又東逕隆中，歷孔明舊宅北。亮語劉禪云：『先帝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即此宅也。」見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頁 2367。

60 另，還有張輔指出劉備曾「屢造其（案：孔明）廬」，見西晉・張輔，〈名士優劣論〉，唐・歐陽詢編、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409。又有常璩稱：「先主遂造（諸葛）亮，凡三往。」見晉・常璩撰，任乃強校：《華陽國志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362。

61 魚豢除了企圖摧毀「三顧茅廬」這段佳話之外，尚有「誇飾魏延『子午道奇謀』以襯孔明拙於戰略」、「魏將驍勇善戰以對比孔明戰術失敗」、「藉孟達之依違反覆凸顯孔明識人不明」等等，均深寓魚豢仇蜀之論。詳可參王文進，〈論魚豢《魏略》的三國史圖像〉，頁 15-28。

62 《三國志》卷 35《蜀書・諸葛亮傳》，頁 918。

63 《三國志》卷 46《吳書・孫討逆傳注》引《吳曆》，頁 1221。

君主授末命時的一種習慣用語，[64]但顯然金氏並未將胡沖之言置諸所有三國文獻中「專美本國」的語脈詳加推敲，[65]因為胡沖之言在陳壽著書之時顯然被裁而不用，導致「白帝城託孤」成為獨映千古的佳話，而孫策託孤在陳壽《吳書・孫討逆傳》中卻只有以下平板的敘述：

> 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66]

這種託孤的方式只是歷代君主家天下的一般故事，和胡沖所載心繫天下、坦然無私的格局，不能同日而語。

## （三）《吳曆》借曹操之口道出「生子當如孫仲謀」的浩歎

江東孫氏政權的建立，和孫堅、孫策父子關係密切，尤其孫策更是打下江東領土的立基之士。根據張勃《吳錄》所記載其所上表，他年方十七便領兵作戰[67]，陳壽評曰：

> 策英勇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68]

從這段評語來看，孫策是相當勇武果敢的將帥之才，而《吳曆》更運用了敵國人物的褒揚進一步深化這位開國之君的強悍：

> 曹公聞策平定江南，意甚難之，常呼：「猻兒難與爭鋒也。」[69]

---

64 金性堯，《三國談心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頁 102-106。

65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未見有其他吳國史籍記載此事，故《吳歷》此條記錄實還隱含著某種訊息，即與張昭所代表的江北儒學士人的失勢有密切關聯，從中也洩露了胡沖的政治立場與吳會本土集團之張勃有所扞格。此正是思考孫吳，甚至是三國時期南方史料的另一種方式，過去已有諸多研究提出東吳政權中存在著「淮泗集團」與「吳會集團」之爭的現象。可詳參以下著作，如田餘慶，〈孫吳建國的道路——論孫吳政權的江東化〉，《秦漢魏晉史探微》，頁 262-295。方北辰，〈孫吳時期江東世家大族的政治活動〉，收錄於氏著，《魏晉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頁 19-58。王永平，〈張昭政治地位的變遷及其與孫權衝突的原因〉，《孫吳政治與文化史論》，頁 162-184。鄭欽仁等編著，《魏晉南北朝史》（臺北：里仁書局，2007），頁 95-97。

66 《三國志》卷 46《吳書・孫討逆傳》，頁 1109。

67 《三國志》卷 47《吳書・吳主傳注》引《吳曆》，頁 1107。

68 《三國志》卷 46《吳書・孫破虜討逆傳》，頁 1112-1113。

除了孫策這位天生將才外，吳國首位稱帝的孫權也有令曹操心服口服的帶兵能力：

> 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欲擊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敕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昇兒子若豚犬耳！」權為戲與曹公，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與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撤軍還。[70]

這段文字不只暗諷曹操的畏縮怯戰，更進一步藉曹操之口道出孫權英姿勃發的造型。有關此一歷史事件《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云：

> （建安）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攻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71]

竟然視吳軍為曹所破。進而《三國志・吳書・吳主傳》則云：

> （建安）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軍，歎其齊肅，乃退。[72]

雖然確有曹公嘆讚權軍一事，但「生子當如孫仲謀」如此精彩的傳神之筆卻為陳壽刪除。但最重要的是，曹操口中「生子當如孫仲謀」的名言，實乃吳人胡沖借曹操之酒杯澆吳人胸中之塊壘。後人不察，胡沖之言遂成千古傳誦之佳句。觀南宋辛棄疾（1140-1207）〈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一詞就煞有其事當成典故嵌入其作：

> 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

69 《三國志》卷 46《吳書・孫討逆傳注》引《吳曆》，頁 1109。
70 《三國志》卷 47《吳書・吳主傳注》引《吳曆》，頁 1119。
71 《三國志》卷 1《魏書・武帝紀》，頁 37。
72 《三國志》卷 47《吳書・吳主傳》，頁 1118。

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73]

經〈辛詞〉此一渲染，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也照科搬演，遂成小說中有名的橋段。

## 四、張勃《吳錄》嚴守東吳立場

張勃其人相關資料甚少，[74]今日僅能藉由《史記・伍子胥列傳索隱》曰：「張勃，晉人，吳鴻臚嚴之子也，作《吳錄》，裴氏注引之是也。」[75]及《三國志・吳書・孫皓傳》：「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晉文帝。及還，儼道病死」[76]可知張勃為張儼之子。

關於張勃《吳錄》的成書年代，由於其作者的史傳闕如，一直沒有確切的年代，今日據《裴注》於《三國志・吳書・虞陸張駱陸吾朱傳》所引用《吳錄》的一條資料判斷：

（陸）喜字文仲，瑁第二子也，入晉為散騎長侍。瑁孫曄，字士光，至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曄弟玩，字士瑤。《晉陽秋》稱玩器量淹雅，位至司空，追贈太尉。[77]

這段資料最遠說到陸玩，還引用了孫盛《晉陽秋》的資料，查《晉書・陸曄傳》言：

陸曄字士光，吳郡吳人也。伯父喜，吳吏部尚書。[78]

---

73 鄧廣銘箋注，《稼軒詞編年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卷五，頁 548。

74 關於《吳錄》一書，日人松本幸男有〈張勃《吳錄》考〉一文，收錄於立命館大学中國藝文研究會《學林》第 14、15 合併號，1995 年 7 月。對於《吳錄》的作者乃至於其書與韋昭《吳書》、環濟《吳紀》、陳壽《三國志》之間的延續異同比對有詳盡分析，但僅止於帝王稱謂、人名、地名的考證。諸葛亮

75 《史記》卷 66《伍子胥列傳注》引司馬貞《索隱》，見《史記》，頁 2173。

76 《三國志》卷 48《吳書・三嗣主傳・孫皓》，見《三國志》，頁 1165。

77 《三國志》卷 57《吳書・陸瑁傳注》引《吳錄》，頁 1339。

知《晉書》所言陸曄確實就是張勃《吳錄》所言之陸曄，而《晉書・陸曄傳》附陸玩傳云：

> 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賀循每稱其清允平當。……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為三良既沒，國家殄瘁。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雖登公輔，謙讓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79]

再查《晉書・顯宗成帝・咸康六年》記載：

> 六年春正月庚子，使持節、都督江豫益梁雍交廣七州諸軍事、司空、都亭侯庾亮薨。辛亥，以左光祿大夫陸玩為司空。[80]

綜合上引諸條史料，可知《晉書》本傳所云大致如《裴注》所引《吳錄》中的內容，其記錄目前所能見最晚至東晉成帝的咸康年間，而且從其引用《晉陽秋》的狀況來看，《吳錄》成書至少與孫盛同時或者更晚，《晉書・孫盛傳》云：

> 會桓溫代翼，留盛為參軍，與俱伐蜀。軍次彭模，溫自以輕兵入蜀。盛領羸老輜重在後，賊數千忽至，眾皆遑遽。盛部分諸將，并力距之，應時敗走。蜀平，賜爵安懷縣侯，累遷溫從事中郎。……盛與溫牋，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為怪鳥。溫得盛牋，復遣從事重案之，贓私狼籍，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累遷祕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81]

本傳中記孫盛作箋諷刺桓溫事，故遭到桓溫收押行監，所幸最後沒有真的獲罪。但可確定孫盛死於此事之後，觀《晉書》桓溫本傳：

---

78 《晉書》卷 77《陸曄傳》。見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 2023。本文以下索引《晉書》，亦不再說明出版項目，只書傳名。

79 同前註，頁 2024-2026。

80 《晉書》卷 7《成帝紀》，見《晉書》，頁 182。

81 《晉書》卷 82《孫盛傳》，見《晉書》，頁 2148。

> 及石季龍死，溫欲率眾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時知朝廷杖殷浩等以抗己，溫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眾資調，殆不為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眾四五萬。[82]

從本傳知北方石季龍死後，桓溫開始仗軍勢專權跋扈，以至於「八州士眾資調，殆不為國家用」，並且以北伐之名將軍隊開到武昌，《晉書・地理志》載「荊州統南郡、武昌、武陵、宜都、建平、天門、長沙、零陵、桂陽、衡陽、湘東、邵陵、臨賀、始興、始安十五郡，其南陽、江夏、襄陽、南鄉、魏興、新城、上庸七郡屬魏之荊州」[83]可見武昌在荊州。而孫盛諷刺桓溫「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為怪鳥」，照孫盛的語氣看，致書桓溫時正好在湘川盤桓，其中湘川可能指湘水，查《漢書・地理志》記「零陵，陽海山，湘水所出，北至酃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84]又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云：

> 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即陽朔山也。應劭曰：「湘出零山，益山之殊名也。山在始安縣北，縣，故零陵之南部也。魏咸熙二年，孫皓之甘露元年，立始安郡。湘、漓同源，分為二水。南為漓水，北則湘川，東北流。」羅君章《湘中記》曰：「湘水之出於陽朔，則鷁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於其中也。」[85]

這裡酈道元引應劭說法，稱湘水為湘川，又零陵、武昌在晉代皆屬於荊州地界，可以推測孫盛作書與桓溫就是在此時無疑，係《晉書・穆帝紀》所云：「（永和七年）十二月辛未，征西大將軍桓溫帥眾北伐，次于武昌而止。」[86]由此推知孫盛做書與桓溫在東晉穆帝永和七年（公元351

82 《晉書》卷 98《桓溫傳》，見《晉書》，頁 2569-2570。
83 《晉書》卷 15《地理志》，見《晉書》，頁 454。
84 《漢書》卷 28 上《地理志》，見東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1596。
85 《水經注・湘水》，《水經注校釋》，頁 660。
86 《晉書》卷 8《穆帝紀》，見《晉書》，頁 198。

年）左右。又張翰亦為張儼之子，《晉書・文苑傳》載張翰曰：「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父儼，吳大鴻臚。」[87]觀與其同時的顧榮：「顧榮字彥先，吳國吳人也，為南土著姓。……元帝鎮江東，以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諮焉。……六年，卒官。帝臨喪盡哀，欲表贈榮，依齊王功臣格。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哭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撫琴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88]可知張勃的兄弟張翰晚於顧榮，又參《晉書・顧榮傳》中所謂「六年卒官」，推定東晉元帝後紀年至六年以上者當是東晉穆帝永和六年（公元350年），張翰至此年仍存，則其兄弟張勃尚在亦合理，時間上也和孫盛重疊，故知張勃《吳錄》應該在東晉穆帝永和年間之後寫成。

張勃既為江南四姓[89]的後代，《吳錄》又作於東晉之世，則其面對東吳政權就表現出雙重立場：首先，由於孫氏家族出自寒族[90]，張勃本身則是本地郡姓。江南本地士族和出身微寒的孫氏朝廷中本有其根本的矛盾因素。故《吳錄》對孫氏家族壓迫本地士族的惡行惡狀毫不掩飾地揭露[91]；此外，唐燮軍考察《吳錄》現存佚文，仍推測張勃對孫氏的認同情感較陳壽、二陸為深，進而根據韋昭《吳書》作為其撰作《吳錄》的依據[92]。此係本文所謂《裴注》第二類區塊中史籍，是在陳壽完成《三國志》之後才出現的史書，就史學方法和本文的意義而言，《吳錄》乃是對陳壽所建構之三國史的補充與質疑，乃至於解構與重組。

87 《晉書》卷 92《文苑傳》，見《晉書》，頁 2384。

88 《晉書》卷 68《顧榮傳》，見《晉書》，頁 1811-1815。

89 《三國志》卷 61《吳書・陸凱傳》載陸凱上〈疏〉云：「先帝外仗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見《三國志》，頁 1406。

90 《孫吳政治與文化史論》，頁 2-6。

91 孫氏家族與江東地區士族之間的關係可見前引田餘慶、王永平等專書論文。

92 唐燮軍認為張勃《吳錄》是融合了韋昭《吳書》的史料，不滿於陳壽《吳志》而重新編撰成的以孫吳為正統的史籍。事實上此觀點置入本文《裴注》兩種史料裏自可迎刃而解。

## （一）張勃《吳錄》詳細揭露孫策殺戮之內幕

孫堅、孫策兩位建立江東基業的父子，不論在小說演義中或者史家評論中皆見其正面評論，如清何焯說「伯符以勇銳摧破繇、朗，然能繫屬士民，修其政理，遂創霸圖。」[93]祁夢庵說「這時關東起義諸侯，都是平庸的人物，真有作為的，只曹操孫堅二人。……孫策有雄略，善奇襲，且開創東吳用『火攻』的戰術。」[94]而陳壽亦給予高度的評價：

> 孫堅勇摯剛毅，孤微發跡，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95]

這段文字中比較負面的敘述僅止於「輕佻果躁」。[96]但是諸如勇摯剛毅、忠烈之壯、英氣傑濟、猛銳冠世等評價都屬正面，然而對照陳壽對於孫權的評價：

> 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既臻末年，彌以茲甚。至於讒說殄行，胤嗣廢斃，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97]

孫權為吳國立國之君，陳壽甚至評為「人之傑」矣。但是其果於殺戮的性格似乎和其父兄的評價遙遙相應，孫氏一門的缺點竟有相當的一致性。但是陳壽在《孫破虜討逆傳》中並沒有著墨太多孫堅、孫策果於殺戮的事蹟。事隔六十年[98]，張勃《吳錄》站在江南士族曾經遭受迫害的

---

93 《義門讀書記》卷 28《吳志》，頁 474。
94 《三國人物論集》，頁 36-38。
95 《三國志》卷 46《吳書・孫討逆傳》，見《三國志》，頁 1112-1113。
96 可另參王永平，〈論孫權父子之「輕脫」〉，《孫吳政治與文化史論》，頁 4。
97 《三國志》卷 47《吳書・吳主傳》，見《三國志》，頁 1149。
98 陳壽《三國志》約成書於公元 289 年，張勃《吳錄》本文推斷成書於東晉穆帝永和年間，為公元 350 年左右。據此稱兩書間隔六十年。

立場道出孫策以武力鎮壓江東賢士的過程，似乎對陳壽輕輕帶過的史筆提出了質疑。

陳壽在敘述孫策據有江東的創業過程中，當擊敗劉繇後的下一個征伐對象是嚴白虎：

> 吳人嚴白虎等眾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冶，乃攻破虎等。[99]

這一段攻伐的過程，陳壽僅用「渡浙江，據會稽，屠東冶」凡九字帶過，然而從其所用「屠」亦可察覺過程中殺伐之慘烈。《裴注》引用張勃《吳錄》更是鉅細靡遺地道出孫策這段攻城掠地的過程：

> 時有烏程鄒他、錢銅及前合浦太守王晟等，各聚眾萬餘或數千。引兵撲討，皆攻破之。策母吳氏曰：「晟與汝父有升堂見妻之分，今其諸子兄弟皆以梟夷，獨餘一老翁，何足復憚乎？」乃舍之，餘咸族誅。策自討虎，虎高壘堅守，使其弟輿請和。許之。輿請獨與策會面約。既會，策引白刃斫席，輿體動，策笑曰：「聞卿能坐躍，勦捷不常，聊戲卿耳！」輿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戟投之，立死。輿有勇力，虎眾以其死也，甚懼。進攻破之。虎奔餘杭，投許昭於虜中。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100]

這一串文字中有兩個事件，一個是鄒他、王晟等江南本地人遭到族誅的慘烈對待；另一個是孫策藉由殺嚴白虎之弟嚴輿立威，並驅逐嚴白虎的過程。王晟一族慘遭夷滅應該為吳地人民口耳相傳的慘案。何況照《吳錄》的筆意，似乎孫策本欲將老翁王晟一併誅殺，在最後關頭才逢孫堅夫人吳氏救下。至於白虎事，《吳錄》的記載也可以說呼應了陳壽對孫策所下「輕佻果躁」的斷語，因為他畢竟獨自面對可能有實力刺殺自己

99 《三國志》卷 46《吳書・孫破虜傳》，見《三國志》，頁 1104。
100 《三國志》卷 46《吳書・孫破虜傳注》引《吳錄》，見《三國志》，頁 1105。

的嚴輿，即便是為了擊殺之以打擊嚴白虎士氣，但是其以身犯險的豪賭恐怕並不足取。

另一則孫策殺戮江南士族的記載則發生在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戰時，陳壽在《孫破虜討逆傳》中寫道：

> 建安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會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101]

裴松之在這段文字下注引張勃《吳錄》云：

> 時有高岱者，隱於餘姚，策命出使會稽丞陸昭逆之，策虛己候焉。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講。或謂之曰：「高岱以將軍但英武而已，無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或云不知者，則某言符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為人，惡勝己者，若每問，當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辯義，此必危殆。」岱以為然，及與論《傳》，或答不知。策果怒，以為輕己，乃囚之。知交及時人皆露坐為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策惡其收眾心，遂殺之。岱字孔文，吳郡人也。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也。太守盛憲以為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謙未即救，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為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大小皆為危竦，以貢宿忿，往必見害。岱言在君則為君，且母在牢獄，期於當往，若得入見，事自當解。遂通書自白，貢即與相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岱將見貢，與友人張允、沈**瞻**令豫具船，以貢必悔，當追逐之。出便將母乘船異道而逃。貢須臾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於船，江上便殺之，已過則止。使與岱錯道，遂免。被誅時，年三十餘。[102]

101 《三國志》卷 46《吳書・孫破虜傳》，見《三國志》，頁 1109。
102 《三國志》卷 46《吳書・孫破虜傳注》引《吳錄》，見《三國志》，頁 1109-1110。

張勃在紀錄孫策因為讒言而錯怪高岱，進而因為厭惡其聲望威脅自己的地位而選擇殺害高岱。而令人玩味的是，張勃在這段故事之後竟然不惜花費比本事更多的字數來敘述高岱其人：原來高岱此人不僅是吳郡的傑出人才，其為主盛憲遠求外援、為母親親赴凶險的大義令人激賞之外，更重要的是他與孫策一樣是與許貢為敵的一方，張勃此筆或許不乏惋惜孫策此舉等同輕斷相同陣營的助力之意。而令人弔詭地是在前一則《吳錄》的記載中，嚴白虎因為逃到許昭陣營，孫策因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夫之志也」情願放過大敵。言猶在耳，卻在不久之前卻殺害高岱此一才德不下於許昭的江南名士。這樣看來，張勃顯然站在江東本位的立場，是以對陳壽淡筆紀錄孫策迫害江南士人的文字深表質疑，而這些記載也弱化了陳壽筆下一代英傑的孫策形象。

## （二）《吳錄》補充孫策與袁術劃清界線的表狀

孫策勢力的崛起和袁術的幫助有很大的關係，祿夢庵言「以前孫堅，可能與袁氏有關係，否則即是仰慕袁術的聲望，故北上後即隸袁術部下。他之殺南陽太守張咨，也可能是受袁術的指使，因這時袁術出奔在外，無地盤。」[103]如果不是袁術將孫堅的舊部還給孫策，則其不會輕易據有江東。實際上揚州本是袁術所據有的領地，而袁術因為僭位稱尊號，導致漢末群雄攻擊，最後他的地盤為孫策所接收。但是名義上是袁術部下的孫策，卻沒有遭到反賊的指控。原因在於「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104]。」而《吳錄》就記載了這樣一紙扭轉孫氏政權反賊身分的表狀：

> 策上表謝曰：「臣以固陋，孤持邊陲。陛下廣播高澤，不遺細節，以臣襲爵，兼典名郎。仰榮顧寵，所不克堪。興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至被詔書，乃知詐擅。雖輒捐廢，猶用悚悸。臣年十七，喪失所怙，懼有不

103 《三國人物論集》，頁 36。
104 《三國志》卷 46《吳書・孫破虜傳》，見《三國志》，頁 1104。

> 任堂構之鄙，以忝析薪之戒，誠無去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駑懦不武，然思竭微命。惟術狂惑，為惡深重。臣憑威靈，奉辭罰罪，庶必獻捷，以報所授。」[105]

這則上表不只對於孫策本人，即便是整個孫家或當時已經隱然建立起規模的江東政權有著相當重要的意義：一旦成為袁術的黨羽，則孫策將難容於當世。實際上他一度踏進反賊之名的陷阱，因為照此上表來看，袁術曾經假詔表孫策為殄寇將軍。雖然孫策及時發覺，但若是深究其罪，孫策也難逃責難。何焯言「策前此猶為術部曲，自絕術，乃正名漢籓，得以自立矣。後曹公亦以策絕術授討逆之號。」[106]故孫策才在此表中鄭重其事地說明自己效忠漢室，與袁術恩斷義絕。

本文進一步認為：張勃《吳錄》一旦面臨江東政權整體性的榮辱時，可斷然放下與孫氏家族的芥蒂。因為記載孫策上表一事所挽救的不僅是孫氏一家的清譽，同時也牽涉整個江東政權在漢末亂世中的定位與格局。若以裴松之《注》的角度而言，此一記載除了補充陳壽《三國志》「失之於略」[107]的缺點外，似乎也隱約指責陳壽刪去這篇對於江東政權深具重大意義的表狀。

## （三）「讒言其興乎！」——《吳錄》曝露孫權荒唐亂政

孫策兄弟兩人在《吳錄》中都存在著聽信讒言而果躁殺戮的事蹟，前者如本文上述引用高岱事，而後者則在張勃《吳錄》中揭發得比陳壽更為透徹。其聽信讒言、廢嫡立庶的荒唐行徑，誠如陳壽《三國志・吳張顧諸葛步傳》記載：

> 時長公主壻衛將軍全琮子寄為霸賓客，寄素傾邪，（顧）譚所不納。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全琮時為大都督，與魏將王淩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兵乘勝陷沒五營江〔秦晃〕軍，休、

[105] 《三國志》卷 46《吳書・孫破虜傳》，見《三國志》，頁 1107。
[106] 《義門讀書記》卷 28《吳志》，頁 474。
[107] 見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收入於《三國志》附錄，頁 1471。

承奮擊之，遂駐魏師。時琮羣子緒、端亦並為將，因敵既住，乃進擊之，淩軍用退。時論功行賞，以為駐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休、承並為雜號將軍，緒、端偏稗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搆會譚。譚坐徙交州，憂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108]

陳壽這段記載，前因後果已詳具：讀者既看出全琮父子貪婪嫉妒的小人面貌，亦為奮不顧身的顧譚感到不平。陳壽所載顧家忠厚之意誠如《世說新語・賞譽》所載「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中、顧厚。」[109]王永平也論及顧雍家平衡孫氏與江東儒學大族之間地用心[110]，但張勃更直斥孫權受讒言迷惑：

全琮父子屢言芍陂之役為典軍陳恂詐增張休、顧承之功，而休、承與恂通情。休坐繫獄，權為譚故，沉吟不決，欲令譚謝而釋之。及大會，以問譚，譚不謝，而曰：「陛下，讒言其興乎！」[111]

如果說陳壽的文字只是描述小人弄權的缺失，則張勃的文字就令讀者清楚看到昏君亂政的偏執。而從張勃《吳錄》的寫作年代來看，吳郡士民很可能對這件事極為義憤填膺，故事隔一甲子，張勃的文字足以使昏君、佞幸的行徑躍然紙上。

有關孫權另外一件荒唐事跡，則是關於陸胤。其事亦牽涉全氏亂政，陳壽《三國志・潘濬陸凱傳》記載孫權諸子鬥爭事：

胤字敬宗，凱弟也。始為御史、尚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爭，陰相譖搆，胤坐收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112]

這段文字中加害的小人依然是全氏子弟，但是受害者卻變成了當時丞相陸遜的族子陸胤。其為太子孫和的提拔，即使下獄受刑亦不為所動。然而實際上這件事情有更曲折的來龍去脈。《吳錄》記：

108 《三國志》卷 52《吳書・顧雍傳》，見《三國志》，頁 1230。
109 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582。
110 王永平，〈論顧雍〉，《孫吳政治與文化史論》，頁 192-214。
111 《三國志》卷 52《吳書・顧雍傳注》引《吳錄》，見《三國志》，頁 1231。
112 《三國志》卷 61《吳書・陸凱傳》，見《三國志》，頁 1409。

> 太子自懼黜廢，而魯王覬覦益甚。權時見楊竺，辟左右而論霸之才，竺深述霸有文武英資，宜為嫡嗣，於是權乃許立焉。有給使伏於牀下，具聞之，以告太子。胤當至武昌，往辭太子。太子不見，而微服至其車上，與共密議，欲令陸遜表諫。既而遜有表極諫，權疑竺泄之，竺辭不服。權使竺出尋其由，竺白頃惟胤西行，必其所道。又遣問遜何由知之，遜言胤所述。召胤考問，胤為太子隱曰：「楊竺向臣道之。」遂共為獄。竺不勝痛毒，服是所道。初權疑竺泄之，及服，以為果然，乃斬竺。[113]

張勃在這段史料中再次表露孫權的昏庸無道，事實上這也印證了張勃這樣的本地士族確實和孫氏出身微寒地士人存有芥蒂，甚至有可能是因為作者身處世家大族勢力穩固的東晉時代，故表現出對不以儒學治經起家而與大族扞格不入的孫氏家族的不滿與譴責。

## （四）張勃《吳錄》中塑造先賢風采與東吳代漢之正統性

《吳錄》中除了站在江南士族的立場對孫氏家族有著極不友善的記載，但是一旦涉及江東名士先賢的功績，則難掩其誇示宣揚的立場。張勃既為張儼之子的事實當可推斷《吳錄》係站在江東士族的立場說話。其中同為吳郡四姓家族的陸遜就成了張勃標榜故國英雄的典型人物，時在黃武二年（223）《三國志・吳主傳》載：

> 二年春正月，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是月，城江夏山。改四分，用乾象曆。三月，曹仁遣將軍常彪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須中州。[114]

知黃武二年有魏軍來犯吳國，其實當時吳國是三面受敵：

113 《三國志》卷 61《吳書・陸凱傳注》引《吳錄》，見《三國志》，頁 1409。
114 《三國志》卷 47《吳書・吳主傳》，見《三國志》，頁 1129。

> 又備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為曹丕大合士眾，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115]

從以上《三國志・陸遜傳》的記載來看，局勢對東吳不利，再觀陳壽《三國志・先主傳》云：

> 孫權聞先主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許之，遣太中大夫宗瑋報命。[116]

據此吳國雖然憑藉陸遜的策劃大破劉備於猇亭，乃至於舉國欲乘勢一舉滅蜀，結果又使曹丕派出曹真、曹仁二軍分攻吳國江陵和濡須，導致吳國腹背受敵。若據《先主傳》敘述語調來看，應是吳國主動遣使求和以避戰禍。然張勃卻有完全不同的敘述：

> 劉備聞魏軍大出，書與遜云：「賊今已在江陵，吾將復東，將軍謂其能然不？」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痍未復，始求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惟算，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117]

此處對比陳壽、張勃二人的文字可以發現；以陳壽的筆意，劉備雖然戰敗，但是孫權仍然懼怕劉備，在《三國志・先主傳》裡，孫吳是主動議和的一方；但在張勃的文字裡，劉備非但主動求和陸遜，並且反覆無常。而陸遜的答書反而顯示其胸有成竹、勝券在握的泱泱大將之風。

事實上孫權鼎足江東，本來就有氣吞乾坤之志，雖然孫權是三國中最晚稱帝者，但在面對漢獻帝下詔禪位的曹氏政權、以及向來以漢氏宗親自居的蜀漢政權，孫氏已有其天命歸屬。《吳錄》載權告天文曰：

> 皇帝臣權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漢享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氣數終，祿祚運盡，普天弛絕，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叡繼世作慝，淫名亂制。權生於東南，遭值

115 《三國志》卷 58《吳書・陸遜傳》，見《三國志》，頁 1348。
116 《三國志》卷 32《蜀書・先主傳》，見《三國志》，頁 890。
117 《三國志》卷 58《吳書・陸遜傳注》引《吳錄》，見《三國志》，頁 1348。

> 期運，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辭行罰，舉足為民。群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為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曆數在躬，不得不受。權畏天命，不敢不從，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即皇帝位。惟爾有神饗之，左右有吳，永終天祿。[118]

從這段文獻可知：孫權係以即皇位的告天文回應曹魏、蜀漢的正統性，並且將自家東吳的地位拉抬到唯一的正統。它的理由是：漢朝國祚已終，所以認為自己是延續漢朝國祚的蜀漢正統性不攻自破；而曹家雖然擁有名義上取代漢朝的地位，但是孫權卻以本文稍前提過的「應運東南說」來標舉自己才是真命天子。故曹叡雖稱天子卻是偽朝，而皇帝之位不可空虛，所以孫權只能遵從「天命」，即位稱帝。

觀諸陳壽《三國志》中各君王即位均有其「情勢所逼」的故事巧飾：曹丕乃是因為漢獻帝下詔讓位[119]；劉備則是因為要延續漢祚，逼於群臣所請[120]；而孫權的即帝位在陳壽《三國志・吳主傳》中並沒有得到對等的呼應，只在《三國志・吳範傳》提及江南有王氣之說：

>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曆數，知風氣，聞於郡中。舉有道，謁京都，世亂不行。會孫權起於東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數多效，遂以顯名。……初，權為將軍時，範嘗白言江南有王氣，亥子之間有大幅慶。及立為吳王，範時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大王識之邪？」權曰：「有之。」因呼左右，以侯綬帶範。[121]

從這段資料可以見出吳範早就預言孫權會有稱王之舉，並以祥瑞讖緯之說著於當世。此處說明無法盡刪符瑞之意，只是基於其立場的不同巧加裁剪排列。[122]在帝王紀傳中斷然裁抑之，僅書之於列傳：

---

118 《三國志》卷 47《吳書・吳主傳注》引《吳錄》，見《三國志》，頁 1135-1136。

119 《三國志》卷 2《魏書・文帝紀》載漢獻帝禪位文，見《三國志》，頁 62。

120 《三國志》卷 32《蜀書・先主傳》載群臣上尊號文及劉備即位告天文，見《三國志》，頁 888-889

121 《三國志》卷 63《吳書・吳範傳》，見《三國志》，頁 1421-1422。

122 這個看法尚可藉雷家驥的分析為證：「陳壽研判三國是非，既頗有晉本位

趙達，河南人也。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東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123]

趙達其人甚至是因為算出「東南有王者氣」而前往江南安身立命，由此可知孫權本身也一定對「應運東南」的說法深信不疑。若對照前節韋昭《吳書》中的應運東南之說及可推知其前後貫串的脈絡：蓋東吳自孫權前後定有不少此類讖緯之說，認為起於東南的孫氏政權終將會取代漢朝而成為天命所歸。而身為東吳時期的韋昭自不待言，即便是數十年後東晉時期的張勃仍然擁護此說，《吳錄》中的這則孫權告天文即為前後呼應的具體表徵。

## 五、結語

本文以裴松之《三國志注》中引用的三部史籍：韋昭《吳書》、胡沖《吳曆》、張勃《吳錄》作為考察對象。由於三本書名皆有一「吳」字，其作者也都是仕於東吳或來自江東門閥士族的人物，故本文統稱為「三吳之書」。其在三國史的研究領域中，屬於《裴注》重要的一環。而本文認為《裴注》的研究分為兩大區塊，大致而言：其一，《裴注》引用諸書，但凡在陳壽撰《三國志》前已存者，可據此推敲陳壽是基於什麼理由將其刪除？其二，《裴注》中所列《三國志》問世後的史書，

的立場，則晉官方宣佈之金行承魏土說，自不能不顧忌遷就，此為紀魏而傳吳蜀原因之一。漢季半世紀間天下有三正朔，這是當時政治現實的認知問題；奉何者以為真正，則為政治的承認和天意史觀的研判問題。陳壽在政治態度上是因晉而帝魏的，但他實際上是認同當時正朔有三。……巴蜀學派原有天命在魏之觀念，譙周據此倡屬歸命於魏說，因而又另撰〈仇國論〉以明自然之數，視魏晉為『肇建之國』，視蜀漢為『因餘之國』。……遂取法班固《漢書》成例，以列〈傳〉之名行本〈紀〉之實，以述王莽閏餘政權。是則陳壽此紀魏傳吳蜀，實分承師門學術及班氏家法融合而來。……陳壽亦不能不受此師門主張、世俗流行意見所影響。」見氏著，《中古史學觀念史》（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90），頁 306。

123 同前註，頁 1424。

則可藉此推測作者基於何種立場補充，進而挑戰陳壽建構的三國史？總之，本文將《三國志》和《裴注》皆回歸成基本史料，將彼此放入三國史的脈絡中詳加考察，企圖重新繪製三國史新圖像，從而建構較為準確的三國史。「三吳之書」由於橫跨《裴注》的兩大區塊，更是提供此一研究進路重要的基礎。

在「三吳之書」中，韋昭《吳書》和胡沖《吳曆》皆有許多史料遭到陳壽刪減。以前者而言，陳壽《三國志》有意將東吳「應運東南說」邊緣化，以及韋昭認為東吳文化可與北方分庭抗禮的記載，也不為陳壽所取。以後者而言，胡沖筆下不只是「立國戰略」、「臨終託孤」這類誇示東吳的文字遭到刪減，甚至兩則以曹操之口歎揚孫氏兄弟軍威顯揚的史料，也為陳壽所巧妙將其弱化。至於作書於陳壽《三國志》後的張勃《吳錄》，因為其身為江南四姓後代的身分，雖然在陳壽文字的基礎上揭露了孫氏政權的眾多血腥爭霸以及讒言矇主的慘烈內幕，但是一旦碰觸三國政權天命歸屬的大是大非爭論時，張勃則會義無反顧擁護東吳政權的正統性，這也說明《吳錄》對孫氏家族與江東政權論述中的雙重立場。

統言之，「三吳之書」雖然橫跨三國兩晉歷時超過六十年，但是其維護東吳史觀的立場始終一致：孫吳終將應運東南，起而代漢。但是陳壽基於晉吏蜀人的雙重身分，將韋昭《吳書》、胡沖《吳曆》大言東吳正統、巧飾孫氏家族的文字盡力刪棄，以降低孫吳在三國政統史的地位。[124]嗣後，張勃《吳錄》雖然對孫氏家族頗有微詞，披露許多孫氏江東昏庸亂政的內幕，但是對於孫吳正統的維護始終立場一貫。據此，本文在《裴注》的新研究進路中，確實看到了不同於以往的新的三國歷史圖像。

---

124 以此足見探究、解讀三國文獻必須考慮各種層面，方能避免陷於真偽莫明導致弄假成真之困境，誠如李純蛟所言：「當時一些史家，如《魏書》作者王沈、《魏略》作者魚豢、《吳書》作者韋昭等，由於堅持從維護一己的割據集團的利益出發，……因而不可避免出現存己廢彼，導致三國史記載的偏缺不全。」見李純蛟，《《三國志》研究》，頁 66-67。

# 主要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西漢〕司馬遷撰，《史記》，北京：中華書局。

〔東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東漢〕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臺北：明文書局，1988。

〔西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97。

〔東晉〕常璩撰，任乃強校，《華陽國志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2007。

〔北魏〕酈道元注，〔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南朝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清〕胡克家考異，李培南等點校，《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唐〕歐陽詢編、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唐〕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唐〕杜佑撰，王文錦等人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2003。
〔北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97。
〔明〕羅貫中著，〔清〕毛宗崗批評，孟昭連等校點，《三國演義》，長沙：岳麓書社，2006。
〔明〕張鏡心，《易經增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
〔清〕沈家本，《三國志注所引書目》。收入嚴靈峰編：《書目類編》（景印沈寄簃先生遺書本），臺北：成文出本社，1978。
〔清〕杭世駿，《諸史然疑》（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
〔清〕梁章鉅撰，楊耀坤校訂，《三國志旁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清〕錢大昕，方詩銘、周殿傑校點，《廿二史考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清〕嚴可均輯，苑育新審定，《全宋文》，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清〕李慈銘著，由雲龍輯，《越縵堂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7。
〔清〕王鳴盛，陳文和校點，《十七史商榷》，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清〕王夫之撰，舒士彥點校，《讀通鑑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
劉運好校注，《陸士衡文集校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盧弼集解，錢劍夫整理，《三國志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8。

## 二、近人論著

### （一）專書

〔美〕海登・懷特著，陳永國、張萬娟譯，《後現代歷史敘事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王永平，《孫吳政治與文化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CENTRAL LIBRARY NTNU ROC 國家圖書館

方詩銘，《方詩銘論三國人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白壽彝，〈陳壽和袁宏〉，收入氏著，《中國史學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
田餘慶，〈孫吳建國之路〉，收入氏著，《秦漢魏晉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2011。
朱子彥，《走下聖壇的諸葛亮——三國史新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2006。
李純蛟，《《三國志》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2。
吳孝貴主編，《古戰場蒲圻赤壁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
金性堯，《三國談心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馬植杰，《三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唐燮軍，《史家行跡與史書構造——以魏晉南北朝佚史為中心的考察》，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
張大可，《三國史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
張靖龍，《赤壁之戰研究》，開封：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
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90。
楊翼驤，〈裴松之與《三國志注》〉，收錄於張越主編，《《後漢書》、《三國志》研究》，《20世紀二十四史研究叢書》卷五，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
陳翔華，《三國志演義縱論》，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
逯耀東，《魏晉史學的思想及社會基礎》，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
鄭欽仁等編著，《魏晉南北朝史》，臺北：里仁書局，2007。
鄭鶴聲著，鄭一鈞整理，《正史匯目》，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
鄧廣銘箋注，《稼軒詞編年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羅秉英，《治史心裁：羅秉英文集》，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5。
劉節，《中國史學史稿》，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
繆越，《讀史存稿》，香港：三聯書店，1978。

**（二）單篇論文**

〔日〕松本幸男，〈張勃《吳錄》考〉，收錄於立命館大学中國藝文研究會《學林》第14、15合併號（1995.7）。

〔日〕滿田剛，〈王沈《魏書》研究〉，《創価大学大学院紀要》第20集（1999），頁263-278。

〔日〕田中靖彥，〈《漢晉春秋》に見る三國正統觀の展開〉，《東方學》第110輯（2005.7），頁49-64。

王文進，〈論魚豢《魏略》的三國史圖像〉，《中國學術年刊》33期（2011.6），頁1-34。

王文進，〈論王沈《魏書》對三國史的詮釋立場〉，發表於「第14屆『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2012年5月4-5日。

王文進，〈習鑿齒與諸葛亮神話之締造〉，《臺大中文學報》38期（2012.9），頁71-120。

王文進，〈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裴松之《三國志注》的兩種讀法〉，發表於「林文月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臺灣大學，2013年9月，頁113-142。

王文進，〈論《江表傳》中的南方立場與東吳意象〉，《成大中文學報》第46期（2014.9），頁99-136。

王建國，〈孫盛若干生平事迹及著述考辨〉，《洛陽師範學院學報》3（2006），頁71-73。

朱曉海，〈西晉佐命功臣銘饗表微〉，《臺大中文學報》第12期（2000.5），頁147-192。

吳直雄，〈習鑿齒及其相關問題考辨〉，《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40期4卷（2009.7），頁74-80。

唐燮軍，〈韋曜《吳書》考辨——兼論《建康實錄》對《吳書》的徵引〉，《中國典籍與文化》第71期（2009），頁66-73。

陳楠，〈淺論《三國志注》的歷史文獻學價值〉，《山東圖書館季刊》3期（2008.9），頁91-95。

張子俠，〈《吳書》作者考辨〉，《史學史研究》第130期（2008），頁110-113。

### （三）學位論文

方圓，《習鑿齒之史學》，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論文，2009。

余志挺，《裴松之《三國志注》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 Selected Bibliography

[Western Jin Dynasty]Chen Shou, [Song of Southern Dynasties] Pei Songzhi comment. Records of Three Kingdo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 1997.

[Song of Southern Dynasties] Fan Ye, [Tang Dynasty] Li Xian comment. History of Eastern Han ,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 1997.

[Song of Northern Dynasties] Si Ma Guang, [Yuan Dynasty] Hau San Xing comment. History as a Mirror,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 1997.

[Ming Dynasty] Luo Guan Zhong, [Qing Dynasty] Mao Zonggang comment, Meng Zhao Lian etc. ed.: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Cheung Sha: YueLu Book Co., 2006.

Lu Bi, Qian Jian Fu ed.. Lu Bi's Commentary to Records of Three Kingdom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Works Publishing House, 2006.

Wang W.-J.(2011). How do Yu Huan Construction's the Three Kingdoms History Image in His Book Weilüe (or Brief Account of the Wei Dynasty). Studies in Sinology, 33, 1-34.

Wang W.-J.(2012). The Discussion on the St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History In the Wang-Shen "Wei Manual". 1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ety and Culture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ipei: Tamkang University.

Wang W.-J.(2012). Xi Zaochi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yth of Zhuge Lia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38:71-120.

Wang W.-J.(2013), Deconstruction and Rebuilding of Three Kingdoms History: Two Kinds of The Discussion on Pei Songzhi's Comment of The Book Records of Three Kingdom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r. Lin Wen-Yue'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Legacy, pp.113-142,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ang W.-J.(2014), The Discussion on the Stance of the South and Dong-Wu Imagery in 'Jiang-Biao Biography',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46: 99-136.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TAIWAN ROC

# The Discussion on "*Three Books of Wu*" in Pei Songzhi's *Annotation for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Wen-Jin Wang***

## Abstract

This thesis discusses of three historical books in Pei Songzhi's *Annotation for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Wei Zhao's *Wushu* (or *Book of Wu*), Hu Chong's *Wuli* (or *History of Wu*), and Zhang Bo's *Wulu* (or *Records of Wu*) as the object of investigation. Since the three books titles there is a "Wu" word, its authors are also Eastern Wu's official or born in a noble family, so those historical books referred to herein as "*Three Books of Wu*" in this thesis. Those books in the study fields of Three Kingdoms histories belonges to Pei Songzhi's *Annotations*. And this thesis take research perspective as there are two research category of Pei Songzhi's *Annotation for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In general, First research category pay attention to texts used in Pei Songzhi's annotations which written before Chen Shou's *Records of Three Kingdoms*, but not used by Chen Shou. Second research category pay attention to how does Pei Songzhi add or challenge some point of Chen Shou's through choose those texts in his annotations which written after Chen Shou's *Records of Three Kingdoms*. In short, This thesis take the view point as *Records of Three Kingdoms* and Pei Songzhi's *Annotation for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are both historical books. And try to put two books to each other's historical narrative, to rediscover the images of Three Kingdoms history, and then construct the history of Three Kingdoms more real.

* Honorary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Keywords: *Annotation for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Chen Shou, Pei Songzhi, Sun Wu, North-South confrontation, Wei Zhao's *Wushu* (or *Book of Wu*), Hu Chong's *Wuli* (or *History of Wu*), Zhang Bo's *Wulu* (or *Records of Wu*)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